

跨越百年重新思考：泰戈尔诗句翻译 与清华演讲之意义

王敬慧 李敏 杨玲

摘要：1924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象征着中印文化交流的深化，还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和文化追求。要探讨泰戈尔清华演讲的重要性，首先要通过翻译视角审视《清华周刊》在传播泰戈尔作品与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泰戈尔诗句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20世纪，《清华周刊》翻译介绍了大量的泰戈尔作品，并详细报道讨论了泰戈尔的20年代演讲，使更多清华学子能够思考其思想，同时也促进了对其作品的研究。泰戈尔的清华演讲通过强调精神高于物质、重视美学教育和大爱情怀，不仅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行动指南，还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产生高度契合。这种理念上的共鸣，增强了泰戈尔在清华及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根据2024年发现的最新史料，结合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及其精神理念，同时结合泰戈尔名言“The world has kissed my soul with its pain, asking for its return in songs”的汉译，深究其中引起中国读者广泛讨论和共鸣的诸要素，可以看出：泰戈尔的精神不仅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也在民间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泰戈尔的清华演讲不仅是一次文化交流事件，更是中印两国知识分子思想碰撞的催化剂。通过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学者拓展了文化视野和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的相互理解，为未来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泰戈尔；清华大学演讲；《清华周刊》；文化翻译；厚德人格

收稿日期：2024—05—28

作者简介：王敬慧（1972—），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李敏（1997—），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杨玲（1983—），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学科服务、信息素养教育。

1924年，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来到中国，这个他自幼就向往的古老而伟大的东方大国。在中国，泰戈尔与中国学界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其中，在清华大学开展的学术讲演，引人注目。

一、从翻译的角度看《清华周刊》与泰戈尔研究

2024年是泰戈尔访华100周年。1924年5月1日，他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清华大学以多种形式致敬这一历史事件，重温经典，深入挖掘泰戈尔文学作品的内涵与意义。比如，为了纪念泰戈尔访问清华100周年、促进学术探索和文化理解，清华大学图书馆于2024年4月至5月特别举办了“泰戈尔与清华人的无问西东”纪念活动，为师生提供了数百本与泰戈尔相关的书籍目录和专题书展，以及具有百年馆藏历史的泰戈尔书刊特展，其中不仅涵盖了泰戈尔的作品，更有诸多珍贵的中译本及丰富的研究史料。在这个穿越百年的纪念展览中，可以发现，《清华周刊》对泰戈尔诗歌和演讲的翻译和介绍为泰戈尔精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清华师生乃至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打开了一扇了解泰戈尔的窗口。因此，本文将梳理《清华周刊》中对泰戈尔清华之旅的相关译介和报道，回顾百年前为中印文化交流搭起桥梁的诸位清华学者和译者的贡献，揭示汉语翻译对促进泰戈尔思想在华传播的重要意义，以期为当今中印学术文化交往带来新的启示。

《清华周刊》承载了清华23年的历史（1937年1月至1947年1月因停刊不计算在内），是清华大学历史的缩影。它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原名《清华周报》，同年9月22日改名为《清华周刊》。清华改办大学后，《清华周刊》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刊物，由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内容有言论、译丛、文苑及校闻等。1937年1月停刊，1947年2月复刊，1947年9月25日被列入禁刊，停止发行。作为一份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以学生的视野反映了当时的校园生活和学校的发展。吴景超先生认为：“清华的周刊，好像是一国的报纸”；“清华若是没有周刊，其不便有似于一国没有报纸”。^①同时，《清华周刊》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国文周报》外，几乎难以找出第二种和《清华周刊》有同样分量

^① 吴景超：《我对于清华出版物的意见》，《清华周刊》，1920年第193期，第2页。

的周刊。^①一份学生刊物，能延续如此长的历史，具有如此规模，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鲜见的。

《清华周刊》中刊载了多条与泰戈尔相关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对泰戈尔其人以及作品的关注；二是对泰戈尔访问清华行程的关注；三是泰戈尔访华后，对泰戈尔的影响力的评价。以下将以《清华周刊》为背景，研读20世纪10—20年代泰戈尔研究在清华的实况。

《清华周刊》上较早介绍泰戈尔的相关文献，见于1917年第106期、110期、111期三期连载的署名为“成”的作者所写的《印度诗人塔果尔传》，文章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以及办学的创举。1918年夏，时任清华大学法文教授的宋春舫在《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国运与文学》一篇中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作品，称赞“塔各尔（Tagore）之著作对于祖国，适足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苦。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②1919年6月，《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期次的表述完全与原文献一致）中又刊载了吴景超翻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小主人》。可以看到，泰戈尔访华之前，清华师生已经对泰戈尔有了一定的了解。

泰戈尔访华前夕的1923年，《清华周刊》特约清华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毕树棠先生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③这篇《太戈尔研究指南》刊载在《清华周刊》第293期上，整理了1913年至1923年间中、英文重要杂志上关于泰戈尔著作的文章，其中中文文章74篇、英文文章83篇。在《太戈尔研究指南》的前言部分，毕树棠从资料整理者的视角，详细介绍了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中英文杂志内关于泰戈尔的著作。同时他也说明了在当时境况下，材料搜集的艰辛之处。^④

① 《清华周刊》（第一卷，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② 宋春舫：《国运与文学》，《清华周刊》，1918年第四次临时增刊，第8—9页。

③ 关于毕树棠所撰写《太戈尔研究指南》的内容，请参考清华大学图书馆数字馆藏《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年第6期，第24页。

④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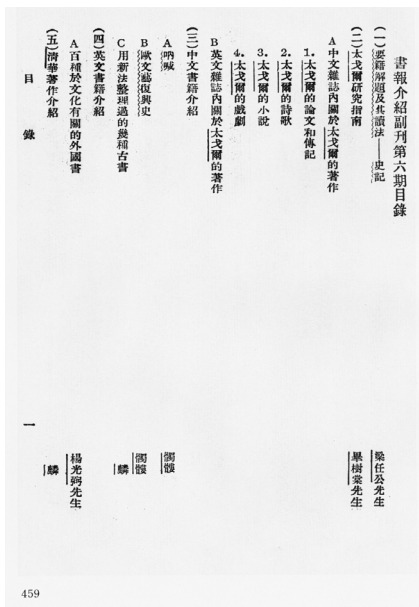


图1《清华周刊》总第293期目录 图2《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年第6期目录

关于泰戈尔访华的行程，1924年5月2日第312期的《清华周刊》“国情述要”栏目介绍了泰戈尔到京的基本概况：“泰氏已于四月二十三日晚七时安然到京矣。到京后住北京饭店，同行者有数印人，并王统照、徐志摩二人，梁任公等在北海宴请泰氏。英美协会亦开大会欢迎之，在京演讲次数地点未定，惟泰氏喜露天讲演云，泰氏将在清华小住。”^①在同一期即向清华师生通报“印度诗人太戈尔已于本星期二来校寄宿”。^②该栏目第61页还有更多描述：“印度诗人太戈尔前于四月二十三号由济来京，寓北京饭店。将于四月二十八号至五月二十号来清华小住，下榻后工字厅。且闻将在清华演讲数次，以惠我闻云。我清华景物幽静，又与西山诸名胜相距咫尺，诗人居此，必多吟咏资料；且太氏为当代诗圣，惠然肯来，则将来清华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经其品题，尤为莫大之荣幸也。”^③可以看出清华师生对泰戈尔此次访问的殷切期待。

① 《泰戈儿到京》，《清华周刊》，1924年第312期，第82页。

② 《新闻一要闻》，《清华周刊》，1924年第312期，第34页。

③ 同上，第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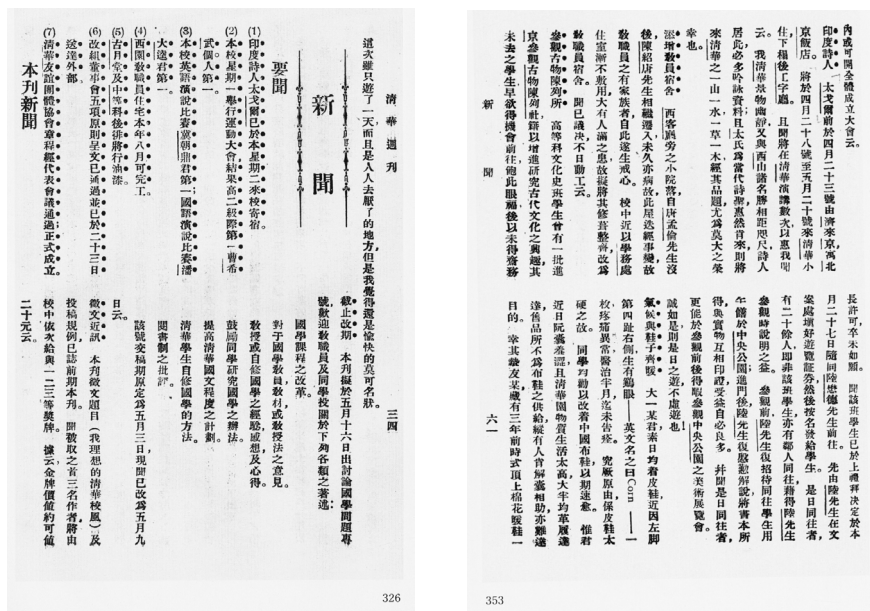


图3、4 《清华周刊》1924年第312期“新闻—要闻”栏目

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5月1日下午3点至5点，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所以“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后，受益良深”。^①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自己带回印度。5月1日晚8时半，泰戈尔在旧礼堂演讲，“大意谓东方文明之美及西方物质文明之卑劣，与其在京所讲者，大同小异。”^②

① 《太氏介绍》，《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第37页。

② 《太氏演讲》，《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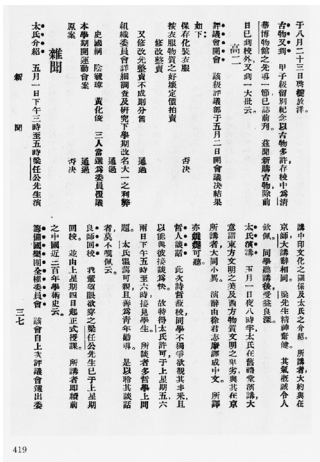


图5《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关于泰戈尔在清华活动的报道”

有关泰戈尔在清华的行程，《清华周刊》1924年5月9日第313期也有三处报道。首先，“新闻”栏目的“要闻”前三条都是关于泰戈尔在清华的活动情况，即：（1）诗哲太戈尔曾于四月二十九至五月日“驻锡”清华；（2）上星期六（五月三日）学生会开俱乐大会且欢迎太戈尔诗哲；（3）上星期四太戈尔为全校同学讲演。^①一方面是对泰戈尔在清华行程的回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泰戈尔对清华文学社和学生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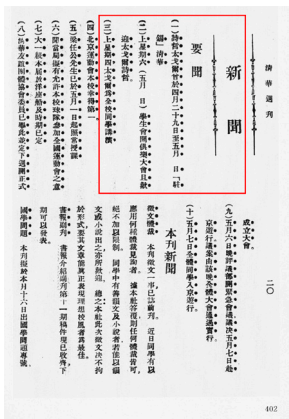


图6《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新闻一要闻”栏目

① 《新闻一要闻》，《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第20页。

“新闻”栏目详情中，学生会俱乐大会的主要内容即为报道欢迎泰戈尔的活动。5月3日，清华学生举办欢迎泰戈尔活动，在新礼堂静候泰戈尔，“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①全体同学起立致敬，并在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辞后唱校歌。欢迎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以及国乐和昆腔等节目。^②在学生各会社的报道中，也记录了文学社讨论欢迎泰戈尔事宜。^③5月2日和3日两日下午5时至6时，泰戈尔还专门接见学生，“所谈多哲学上问题。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云。”^④泰戈尔非常愿意和清华的学生交流，还接受了学生的访谈，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根据徐志摩的描述，泰戈尔“自己以为与学生的谈话是很投机的”^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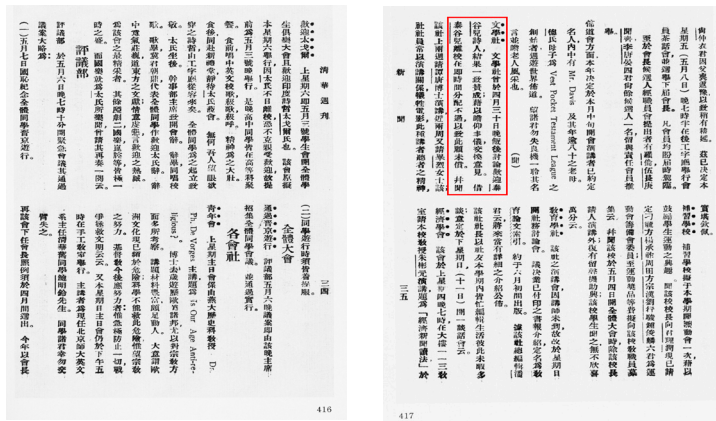


图7、8 《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关于泰戈尔在清华活动的报道”

《清华周刊》中，对泰戈尔的称呼先后使用了“诗圣”和“诗哲”这样的称谓，将泰戈尔入住清华称之为“驻锡”。第313期中还使用了“泰戈儿”的译法。在“国情述要”栏目中，在“关于泰戈儿到京后之所闻”中，记录了泰戈尔在京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以及一系列行程。

- ① 《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第20页。
- ② 同上。
- ③ 同上。
- ④ 同上。
- ⑤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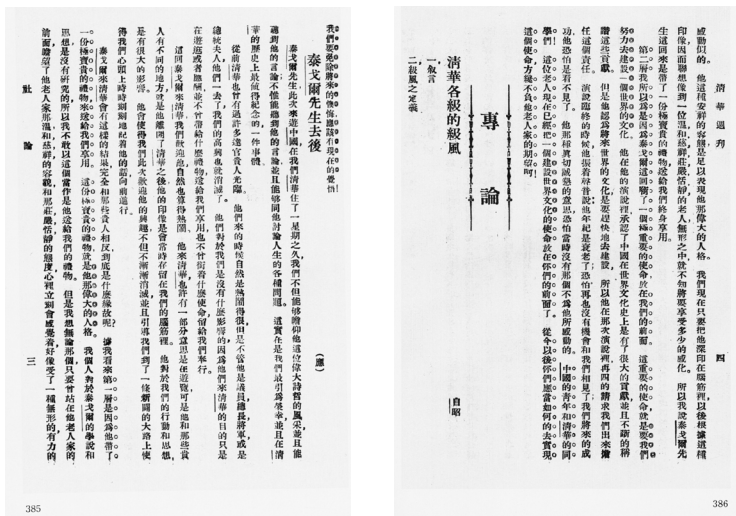


图11、12 《清华周刊》1924年第313期“关于泰戈尔离开清华后的报道”

此外，《清华周刊》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中文译名的不同呈现也值得深入探究。从20世纪10年代年到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的汉语译名存在多种不同的写法，包括“太氏”“太古儿”“太谷儿”“太谷尔”“太戈尔”“泰谷尔”“台莪尔”等。从翻译的角度看，这说明在20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泰戈尔的了解是相对有限的，他的信息和作品在中国并不广泛流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他的作品引起一定程度关注的重要原因。在那个时代，因为信息传播相对困难，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的通讯和交流方式，汉语译名的规范化程度也较低，缺乏统一的译名规范，每位译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口音选择不同的译名。所以，不同的中国学者尝试根据泰戈尔的英文发音进行音译，但由于英文和汉语的语音系统不同，自然也就导致了多种不同的音译结果。同样，对于相同的发音，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的字词表达方式，这也导致了多种不同的译名。

在泰戈尔作品最初传入中国时，由于缺乏可靠的汉语译本，通晓英语的译者往往是最早接触和了解泰戈尔作品的人，比如：叶启芳、王靖、钱家骧、瞿世英、张闻天、英玄、冯友兰、郑振铎、徐志摩、仲云、王统照等。这些译者不仅具备了解英文原著的能力，将泰戈尔所创作的诗歌、戏剧、小说、自传、论文、信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这些译者往往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他们可能会深入研究泰戈尔的生平、思想、文学风格等方面，涵盖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哲学观、诗学观、妇女观、教育观、宗教观等，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给中

国学界。因此，他们既是泰戈尔作品的译者，也是泰戈尔文学作品的研究者，为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清华精神与泰戈尔理念的契合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泰戈尔访问清华 100 周年展览的展品中，除了《清华周刊》这一重要刊物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之前从未面世的珍贵展品——1924 年清华校歌作者汪鸾翔在泰戈尔演讲现场所作的素描及演讲要点记录。据清华大学校史馆介绍，这件展品是由汪鸾翔亲属在此次展览进行期间捐赠的。汪鸾翔（1871—1962）到清华任教的时间是 1918 年，曾教授国文、伦理等课程，1924 年创作清华校歌的歌词。汪鸾翔在泰戈尔讲座笔记中写道：“中国青年之责任，物质文明是虚的，一切奥妙非人所晓，唯天所知，一切美丽人人可有。”汪鸾翔简单的几行随笔精简凝练出泰戈尔思想精神的核心，即重视精神的丰盈、反对功利的物质主义，而这一精神内核也显现于他所创作的清华校歌歌词中——“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器识其先，文艺其从”是我国古代君子为学修身的步骤，表达了清华精神与泰戈尔理念的契合之处，即强调人的内在涵养、精神境界的重要性。除了对身心修养的重视，“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则是呼应泰戈尔的世界主义思想和跨文化交流的精神，内中蕴含宏大格局。汪鸾翔所作的校歌歌词承载的清华精神是以学术救国为己任，以融合东西文化为目标，对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主张兼容并蓄，这一精神又与清华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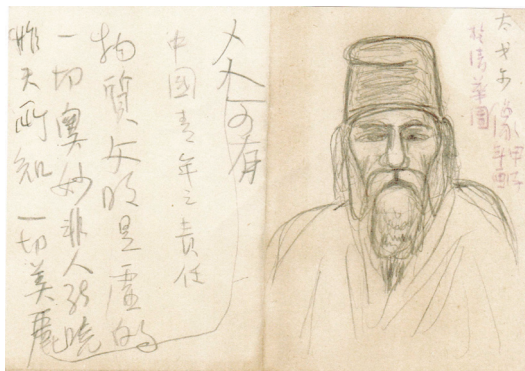


图13 1924年清华校歌作者汪鸾翔在泰戈尔演讲现场所作素描及演讲要点记录
(汪端伟捐赠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历经百年，由汪鸾翔所作的演讲随笔再次显现出泰戈尔思想与清华精神的交相辉映。本文将从泰戈尔作品出发，分析其中的大爱情怀、精神高于物质的思想以及美学教育哲思，并从这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探寻泰戈尔思想与清华精神的内在联系。

首先，泰戈尔在其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常常强调苦难与高歌的紧密关系。在《飞鸟集》中的“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的灵魂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①以及“假如您愿意，您就熄了灯吧。我将明白您的黑暗，而且将喜爱它”。^②泰戈尔认为，真正的艺术和生活智慧在于通过苦难而达到心灵的升华。对苦难的歌颂，也是对生活乐趣的享受。爱尔兰诗人叶芝在为泰戈尔《吉檀迦利》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每天都读拉宾德拉纳特，只消读上一行，就会忘记这世上所有的烦恼。”^③在叶芝看来，泰戈尔的诗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痛苦，人类所有的渴望都在泰戈尔的诗中，歌颂苦难，也就是歌颂希望。

歌颂苦难不仅在印度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也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呼应。比如《孟子·告子》下第十五则提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④这一观点与泰戈尔的思想高度契合。孟子认为，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承担重任，磨砺心志，增强能力。这种通过苦难而实现个人升华的观念，正是泰戈尔所提倡的“苦难与高歌”的核心逻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指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于有大智的和深谋远虑的人永远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伟大人物应当忧天下之忧……”^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反抗痛苦的最好方式是爱与生活，面对苦难，人们应通过爱与生活来反抗痛苦。这一思想也与泰戈尔的观点相似，即在苦难中人们应通过高尚的情感和生活态度，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美好，从而实现心灵的升华和超越。罗曼·罗兰也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实面目——并且爱世界。”^⑥也就是说，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罗兰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在认清苦难和现实的基础上，仍然坚持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泰戈尔关于苦难与高歌的逻辑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都有其

① 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飞鸟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泰戈尔著，西蒙译：《吉檀迦利》，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④ 孟子著，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86页。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⑥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米开朗琪罗传》，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回声。

清华师生始终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自励、自勉、自觉、自立。校训激励着清华学子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勇于拼搏、不断进取，敢担当、有作为。这种勇于在苦难中收获人生意义的精神价值也可视为一种对苦难的歌颂，与泰戈尔诗歌中的精神相呼应。这种歌颂苦难的厚德人格，不仅体现了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共通心理，也展示了不同文化对生命意义的共同追求。

其次，泰戈尔尤为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他坚信，精神的力量远胜于物质的诱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泰戈尔倡导超越物质的束缚，追求内心的纯净与高尚，认为真正的幸福并非源于物质的丰富，而是源于精神的富足与和谐。他在《吉檀迦利》中写道：“哦，诗歌的主人，我盘坐于你的脚下。请让我的生命变得简单直接，如同一支苇笛，盈满你的音乐。”^①在泰戈尔看来，人生可以简单直接，就像芦笛一样由诗哲注满音乐。这种精神高于物质的理念，不仅塑造了泰戈尔的文学风格，也为现代人在物质社会中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重要启示。

清华精神，同样体现了对精神价值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精神内核，清华精神体现在清华校歌中的“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表明清华精神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修养，追求卓越、勇攀学术高峰的学术追求，以及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使命担当。自成立以来，清华大学一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清华学子不仅在学术上追求卓越，更在精神层面不断提升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精神追求不仅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体现，也在清华校友的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在科研领域的突破，还是在社会服务中的奉献，清华精神始终如一地体现着对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

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一历史循环的哲学观点不仅揭示了时间的连续性与历史的演进性，也凸显了精神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的恒久魅力。泰戈尔的精神与清华精神，虽然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却都在强调精神高于物质这一核心理念上展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两者都强调精神价值在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这种一致性不仅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① 泰戈尔著，西蒙译：《吉檀迦利》，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原文为：O master poet, I have sat down at thy feet. Only let me make my life simple and straight, like a flute of reed for thee to fill with music.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核，探索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更好地传承与发扬这些精神。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与发展趋势，探索如何将这些精神理念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最后，艺术美学理念是泰戈尔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泰戈尔的精神思想内蕴丰富，跨越古今、勾连东西，贯穿其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从《吠陀》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经》的印度教正统派哲学——吠檀多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认为：“作为宇宙精神的‘梵’（Brahman）是万物的本源，作为个人精神的‘我’（Atman）与梵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人生的目的是在沉思中亲证梵我合一，摆脱轮回，实现最高的快乐”。^①在这种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泰戈尔用有限解释无限，用多样性解释同一性。他进一步论述了科学与艺术、抽象与人格的关系，肯定且尊崇科学的进步性，但是也指出过分重视科学而忽略艺术与精神所存在的问题。科学以其理性的形式和物质的对象框定了一个无生命的、无情感的世界。而艺术的对象是人格化的，艺术的形式是充满情感的，艺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泰戈尔指出艺术的世界是比科学的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我们能看见它，感知它；我们用全部情感与之交往。它奥秘无穷，因为我们不能分析它或度量它。然而我们可以说：‘它就在这里’”。^②对于泰戈尔来说，艺术的存在，或者说，艺术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需求，艺术的结晶凝聚了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蕴含着真挚的热情和丰沛的能量。艺术凝结了人类的人格，人在艺术中表现的是他的自我而不是他的客体。正如泰戈尔所言：“在艺术中，我们心中的个人向那超人作出答复，而这超人则越过黯淡无光的现象世界，在一个无穷美妙的世界里向我们显示他的自我。”^③

从美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泰戈尔精神中的诗意美学也滋养着清华学子的审美素养与人文追求。在1924年的清华大学演讲中，泰戈尔呼吁清华学生要认识生活的美的原则。一直以来，美育都是清华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艺术美学思想中蕴含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注入生命力。在清华早期校史中，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建筑家辈出，此外，不少清华科学家、杰出工程师

① 泰戈尔著，康绍邦译：《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63页。

都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的一层，摆放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钢琴，赵先生是一位美学的实践者，他不仅是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的理学学士，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还在康奈尔大学担任过物理讲师。赵先生创作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旋律与泰戈尔浪漫诗歌和鸣，以无声之音汇入这座人文图书殿堂；大礼堂西侧立有闻一多先生的雕像，作为新月派的诗人，闻一多的创作也与泰戈尔美学共鸣，他那激昂而深情的诗句：“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她的祖国，爱她的人民”，深入每一位清华学子之心。^①

综上所述，泰戈尔的精神与清华精神在强调大爱情怀、精神高于物质、重视美学教育的核心理念上展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行动指南。这些精神理念中的审美感知力、文化自信心、独立思考精神、创新创造活力以及生命同理心，深深植根于清华精神和泰戈尔美学之中。学界应当继续深入研究与践行这些精神，为中印文明的互鉴做出贡献，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理解，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可为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与力量。

三、一句诗歌的翻译与传播

在泰戈尔访问清华之后，吴汉章先生于1924年在《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上介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英译本泰戈尔著作、译作，以及研究泰戈尔的相关图书20余种，以帮助学生在泰戈尔离去后，继续研读和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他认为关于泰戈尔的作品，清华“图书馆已备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②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关于泰戈尔的资源更加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也更为深入。尽管如此，我们对泰戈尔思想的理解是否更加深入，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文化翻译的视角，以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为翻译背景，结合对泰戈尔精神理念的理解，详细分析泰戈尔名言“The world has kissed my soul with its pain, asking for its return in songs”的汉译，深究其中引起中国读者广泛讨论和共鸣的要素，以此揭示文化翻译对泰戈尔思想在华传播的重要意义。

① 闻一多、周良沛：《闻一多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② 吴汉章：《英文书籍介绍》，《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第34页。

在中文世界，这句诗的一种翻译是：“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充满了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乐观主义的呼唤，曾给无数人带来前行的力量和勇气。对此，读者不仅要感谢泰戈尔，还要感谢如此翻译的译者。实际上，公认的权威翻译是郑振铎先生的版本：“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①这个翻译比较忠实于原文，但是它的意境稍显不足。泰戈尔所描述的痛苦是灵魂的痛苦，不需要用“接吻”这一源自两情相悦的动词来展现。相比较而言，“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是更加诗意化的等效翻译。

首先，“世界以痛吻我”将原文的意象保留了下来。该译文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将“痛”作为名词翻译，使得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诗句中蕴含的痛苦之意。这种选择保持了原诗的形象和意义，并且在目标语言中也保留了相似的表达。

其次，在翻译“我要报之以歌”时，译者通过重新排列词序，将“要我报之以歌”的主语转换，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表达了诗人的意图。这种转换不仅使诗句更加流畅和对仗工整，也更好地传达了泰戈尔想要表达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倡。在泰戈尔看来，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觉醒。事实确是如此，痛苦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促进个人成长、深化自我认知、激发内在力量，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生活中所遭遇的每一次苦难，要努力让苦难点拨我们自己的灵魂，理解“大爱”的必要性。

要更加深入理解和验证诗人泰戈尔这种乐观主义与大爱精神，我们可以再次通过研读泰戈尔自己的作品来寻找如此翻译的精神内核，也可以通过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所发表的演讲来验证。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痛苦”与“歌声”的关系，可以从多篇诗句中有所发现，比如在《飞鸟集》中，“风暴如天神在哭泣，其痛惜大地拒绝其爱”^②。再比如：“世界的快乐与痛苦如同手足，远望着充满怜惜。”^③他认为“大痛与大爱琴瑟和鸣，因为爱被伤害，更能

① 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飞鸟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② 同上，第112页。原文为：The storm is like the cry of some god in pain whose love the earth refuses.

③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 General Press, 2017, p. 258. 原文为：World's pleasure and pain, like brother and sister, lift their pathetic eyes upon my face from afar.

彰显爱的真与美”。^①只要人有感情，他就会感到痛苦。在泰戈尔的诗中，这种痛苦往往通过歌声来表达和抒发。痛苦不仅是人类情感的体现，更是一种深沉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歌声，痛苦转化为一种美的体验，使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真谛。这种痛苦与歌声的融合，使得泰戈尔的诗歌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

泰戈尔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满怀热忱地与清华学子交流，主旨就是强调年轻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对于塑造未来的重要性。演讲伊始，他充满深情地说：“年轻的朋友们，我穿越时代的距离，凝视着你们青春而充满智慧与渴望的面庞。”^②泰戈尔在演讲中表达了对年轻学子的羡慕，他说：“当我还是一个男孩时，在夜色渐渐消逝的黎明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伟大时代。现在，那个伟大时代的意义和讯息已经变得清晰。”^③泰戈尔呼吁年轻人要积极投身于社会，并勇于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他认为，尽管人们对这个时代的伟大性只有模糊的认识，但在痛苦之火的光亮中，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它的伟大。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力量通常暗不可见，但人类有幸给予它们方向，并因此参与自己命运的发展。”^④

泰戈尔敦促年轻人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为生命注入成长的动力，并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他询问年轻学子们：“现在我在中国，我问你们，我问我自己，你们有什么，从你们自家里拿出来，可以奉献给这个新时代？你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⑤泰戈尔对年轻学子的期望在于，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将其美好的传统和价值观融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中，并为文明的进步和美好的未来作

①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Complete "ork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 General Press, 2017, pp.1615-1616. 原文为: Pain on that scale has its harmony in great love; for by hurting love it reveals the infinity of love in all its truth and beauty.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 Reports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China in April and May*, 1924, Calcutta: Karunabindu Biswa, 1924, p.86. 原文为: My young friends, I gaze at your young faces, beaming with intelligence and eager interest across the distance of age.

③ 同上,第86—87页。原文为: When I was a boy, in the dusk of the waning night, we did not fully know to what a great age we had been born. The meaning and message of that great age has become clear today.

④ 同上,第87页。原文为: In human history, though the forces of creation work oftenest in the dark, it is the privilege of man to give them direction, and thus to tak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wn destiny.

⑤ 同上,第88页。原文为: Now I am in China, I ask you, I ask myself, what have you got, what out of your own house can you offer in homage to this new age? You must answer this question. Do you know your own mind? Your own culture? What is best and most permanent in your own history? You must know at least that, if you are to save yourselves from the greatest of insults, the insult of obscurity, of rejection. Bring out your light and add it to this great festival of lamps of world culture.

出个体的贡献。当时的听众是否真正理解了泰戈尔的期望，从汪鸾翔先生在当时所作的演讲记录随笔可以得到验证。其中第一句便是：“中国青年之责任”，这说明讲座呼吁的内容已经得到回应。这也再次证明了泰戈尔精神与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一脉相承。

以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为翻译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句诗的翻译。这个世界用它的痛敲击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觉醒，知道善良的必要。因为世界本来就不美好，充满了战争与伤害，真相可能让人绝望，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可能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冷漠和残忍，我们唯有用善意与歌声来改变这个世界，来让绝望变得不再绝望。如果译为“要我报之以歌”，那只是在突出命运对人类的主宰；但翻译为“我要报之以歌”则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较为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等效翻译。译者已将泰戈尔诗句中的情感和意义传达到目标语言中，并在忠于原文的同时，使译文更贴近中国读者的理解和感受。这一翻译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最深沉的地方，因此常被引用和传播。

四、泰戈尔的演讲作为文化交流的催化剂

重温百年前泰戈尔在清华所做的演讲，为我们更加充分全面地理解和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提供了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泰戈尔的演讲超越了文字本身，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点燃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火。考察泰戈尔思想遗产的持久性，应注重研究他的观念如何在时间的考验中持续存在，塑造中印两国的知识交流，并激励后代文人追求相互理解与文化交往的道路。一方面，泰戈尔以“诗人”的身份影响了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另一方面，泰戈尔思想中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艺和美育理念的生成。通过深入研究他的演讲的哲学基础和诗意细微之处，探讨泰戈尔的思想如何超越语言障碍，在两国文化中引起深刻共鸣。泰戈尔的演讲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分析当时著名人物对泰戈尔在清华演讲的反应和思考，解读泰戈尔的思想如何为中国知识界注入新的视角，影响中国现代文坛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追求，并构想东西方哲学和谐共融的未来。

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之旅中，徐志摩是一位关键人物，他不仅翻译了泰戈尔的演讲，还在此期间写了多篇评论文章。作为中国现代派

诗人的代表，徐志摩从泰戈尔的艺术创作中获取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新灵感。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对泰戈尔即将来华的激动之情，还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惆怅不已：“现世界是个堕落沉寂的世界；我们往常要求一二伟大圣洁的人格，给我们精神的慰安时，每每不得已上溯已往的历史，与神化的学士艺才，结想象的因缘。哲士，诗人，与艺术家，代表一民族一时代特具的天才”。^①徐志摩称赞泰戈尔具有“不朽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对于泰戈尔这次来华，徐志摩最大的盼望在于：“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们现代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个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向内开豁他天赋的才智，自然吸收应有的营养。”^②

作为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十分欣赏泰戈尔的美学精神，他说：“我们所以加倍地欢迎太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③然而，多年以后，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用“捧杀”一词来批评徐志摩等人对泰戈尔的过度赞美。在他看来，对于文学作品或文学人物的过分吹捧或过度批评，都可能导致其真正的价值被掩盖或者失真。

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15年到1925年间，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中国的译介，远远超过其他外国诗人。1915年，陈独秀第一个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歌，此后，泰戈尔散文诗的翻译热潮迭起，读者也迅速增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现代新诗的酝酿期。^④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新浪潮。“新月”二字便是取自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一线新月的幼嫩的清光，触着将消未消的秋云边上，微笑便在那个地方初生在一个浴在清露里的早晨的梦中了。”^⑤“新月”意向建立起中印文化之间的联系，传递中印两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情谊。泰戈尔诗歌中的意象性、韵律感以及丰富的情感表达给中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创作

①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② 同上，第294页。

③ 同上，第295页。

④ 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⑤ 泰戈尔著，郑振铎译：《新月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页。

维度。在新文学运动时期，中国诗人为了摆脱旧诗的韵律和形式，尝试用多种新的方式写诗，而泰戈尔的寓言体、民歌体、剧诗等形式影响了冰心、郑振铎、刘半农、许地山、郭沫若等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写作。

泰戈尔的诗歌不仅具有触动灵魂的力量，更蕴涵着一种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开阔精神，可以启迪和净化人之心灵。因此，泰戈尔精神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普世教育意义，其内核是跨越狭隘与偏见，通过文化艺术的美学修养来实现自我心智成长的“无边界教育”。^①泰戈尔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发展的无限潜能，也影响了不少中国现代文人对艺术美学教育意义的重视。在《泰戈尔》一文中，徐志摩这样评价泰戈尔：“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牲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②就在泰戈尔访华的前两年，1922年，梁启超先生和徐志摩先生分别在清华发表关于美学、艺术与人生的演讲。梁启超先生以《美术与生活》为题，阐释美术专业教育与大众公共美育的区别。他的美学思想旨在将艺术精神、美学精神与人生精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融艺术、美、人生为一体，“借此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而在此之前，梁启超曾于1920年到清华以“略论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为题，做了美学方面的讲座。^③同年，徐志摩用英文发表了题为“Art and Life”（《艺术与人生》）的演讲，他呼吁“要丰富、扩大、繁衍、激化你们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要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希冀通过艺术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④

正如徐志摩所言，泰戈尔来华，“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⑤梁启超说，泰戈尔带给中国人的礼物是：“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患不厌不憎不净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

① Sangeeta Datta, “Transcultural Utopias: Exploring the Afterlive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isions of Utopia, and Aesthetic Formulations in Cultural Diaspora Practice”, *Utopian Studies*, Vol. 33, No. 2, 2022, pp. 223-239.

②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445页。

③ 郑小筠：《华韵清辉：艺术教育在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④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⑤ 同上，第442页。

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的爱。”^①泰戈尔的诗文中，这种绝对的爱生发于他那艺术家的可爱心灵，“水音风声里，诗人的心在生命的波浪上旋转舞蹈，”^②咏唱生命之爱的礼赞。泰戈尔就是以诗人的身份，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人的精神。对于自己来华的演讲，泰戈尔并不在意舟车劳顿，而是关注自己能带给中国什么：“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③泰戈尔以其深刻的谦逊品格和对跨文化交流的开放态度体现出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正是这种谦逊使他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与人沟通，在世界各地通过演讲和文字作品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这反映了他能够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表达人类情感和智慧的能力，这种特质在跨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

百年之前，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泰戈尔以其独特的见解和深邃的哲思，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从而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高潮。一个世纪之后，回望这次文化之旅，泰戈尔的思想不仅在其生前具有影响力，更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断被传承和发扬。通过对他思想遗产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搭建桥梁，激发了对共同精神价值的追求。这位诗人带给我们的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多，他以艺术美学架起的文化交往之桥，连接着中印文化，通向无限且永恒的诗意世界，激励着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的精神。

五、结论

重访百年前泰戈尔在清华留下的文化交流痕迹，再观汪鸾翔在当时听讲座之际所留下的历史文献，岁月钩沉，意义深远。泰戈尔以他的诗人精神为中国与印度搭起了一座蕴含诗意的艺术美学之桥，通向一个崭新的文化美学空间，开启了以徐志摩和泰戈尔为代表的中印文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这座诗意之桥也是中印友谊的象征。在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翻译的重要意义。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是通过翻译发生的，翻译是连接中印文化和美学交流的重要纽带。百年之前，泰戈尔来访清华园之时，徐志摩是传递泰氏思想的重

① 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晨报副镌》，1924年5月3日。

② 泰戈尔著，冰心译：《采思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7页。

③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2页。

要译者，在徐志摩之后，刘半农、郑振铎、冰心、白开元等文人学者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让泰戈尔的诗意美学精神在中国深远流传。

总体而言，泰戈尔1924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超越了那个时刻的时间限制，在中印两国的文化和知识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次演讲不仅反映了泰戈尔对精神价值的深刻追求，还与清华精神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理念形成了共鸣。通过揭示其影响的多重层面，本文旨在更深刻地理解泰戈尔思想的持久影响，以及它在促进这两个伟大文明之间更深层联系中的作用。泰戈尔的演讲通过强调精神高于物质、重视美学教育和大爱情怀，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行动指南。泰戈尔的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还为两国的思想交流和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通过对泰戈尔思想和清华精神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价值在塑造个人品格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泰戈尔的思想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发酵，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相互理解与合作，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和谐与共荣的未来。清华精神中的厚德人格，强调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与泰戈尔的精神追求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思想体系，为中印两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动力。

[责任编辑：王国平]